

端木蕻良 著

化为桃林

端木蕻良，是出类拔萃的满族作
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。他的《科尔
小说，涌动着美好情感的激流，散
芳。本书编集其 20 世纪 30 至 90 年
以真挚的心，流畅的笔，或自叙身
生活感受，或书写乡恋、亲情、友谊，
任感和爱国热忱。书中论及诸多亲历
佳话，兼具丰饶的文学欣赏和史料价值。



家，在现代文学史上
沁旗草原》等长篇
发出北国大地的芬
代散文精品。作者
世遭遇、创作经验，
展现了强烈的社会责
的重大事件和文坛逸事

白屋丛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端木蕻良 著

化为桃林



白屋丛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化为桃林/端木蕻良著;钟耀群编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0. 12

(白屋丛书)

ISBN 7 - 5325 - 2828 - 6

I. 化... II. ①端... ②钟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8360 号

白屋丛书

化为桃林

端木蕻良著

钟耀群 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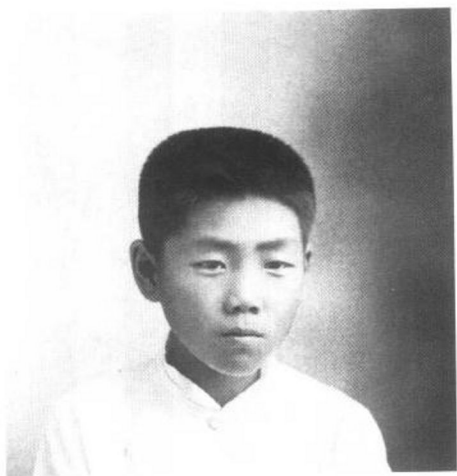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6 字数 250,000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

ISBN 7 - 5325 - 2828 - 6
I·1422 定价: 15.20 元



一九二三年作者在
天津汇文中学时照



作者与萧红
骆元用摄
一九三八年三月二
十一日于西安

作者在校阅柳亚子诗稿
钟耀群摄于虎坊路寓所



作者与妻钟耀群、女儿钟蕪 一九六四年冬于天安门前

编者的话

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,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,比“文化”更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注视与思索。世纪初的“五·四”运动,被称为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;六七十年代那场浩劫,则唤作“文化大革命”;到了世纪之末的今天,曾经压倒一切的“阶级斗争”等词汇渐已淡出,而“文化”则成为各行各业都想攀附的一种“热点”,似乎不如此,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律。本世纪对“文化”的这种重视,无论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,也无论是建设的还是破坏的,都从不同层次反映了中国人这样一种晚来的自觉:文化问题是一切社会变迁的风信仪,而一切社会变迁,最终又必以文化的更新为鹄的。于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——文化人,他们的历史命运、行迹心路,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,一个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问题。

虽然文化人——在古代称作士,历来处于“当路者”与普通民众之间,成为中国社会生活、历史演进中尤其敏感而又活跃的一群,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与思想发展滞缓,他们的路向与心境倒一直比较的单纯。至少从企望为“王者师”的孟子起,他们骨子里总是以先知先觉自居,而当路者与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一点。于是抱着至少是精神上的优越感,他们可以主要从书本中讨生活,以半是历史,半是心想的尧舜禹汤以来的道统,俯瞰着世俗的生活与王权,等待着当路者延为“帝师”,并

进而圆遂其治国济民的种种蓝图,尽管这蓝图往往被前者视为迂阔,而又为后者所漠视。犹疑与困惑也是有的,但除了忠奸真伪一类非士人独有的普遍性矛盾外,主要只是徘徊于出处之间与终极一致的学派归趋上,至于带有文化更新意义的困扰,即使有,也只是至晚明以后方以萌芽状态出现,且尚不具备动摇根本的性质。于是后来被称作“人文精神”的那种知识者的终极理念,那种不可或违的操守与对理想的九死不悔的追求,因其现实内涵的明晰,得以成功地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相对平和的心境;对于所谓“虚静”的不渝强调,多少有着这种历史情境的反映。

然而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,使他们骤然震荡。一切因袭的心理矛盾,由原来偏重于谐和而趋向于尖锐对立。从学与从政,过去由“学而优则仕”相统一,现在因着专业的细化与民族的危亡,变得往往不可得兼;而在这两个层面上,过去虽有新学与旧学,新政与旧政之争,有时也形同水火,但因为归趣其实一致,即有去从,亦不妨大节,有所反复,也无伤根本。然而现在,一切新与旧的较量,却往往有了本质意义的对立。即使有幸而仍专注于学术文化的揣摩研创,但面临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,面临他们曾倚以为生的旧文化传统的基础动摇,书斋生活也再不平静,从新从旧抑或新旧合璧的抉择,已关乎民族文化的何去何从;而一旦自觉地或者被动地卷入社会活动,从新或者从旧,也不再仅是个人进退与对一姓国家的是否忠诚,它已直接关乎亿万兆众之民族的能否生存。而这一切又都使他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痛苦选择,对那曾视以为生命的一贯的节操、信念等等,究竟是应当顺应还是反叛:是幡然觉醒,成为旧世界的挑战者;还是身心分离,在感受甚至祁向着新生的同时,却无可奈何地随着旧势力的沉沦而沉沦。

NA266/06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抉择痛苦,还不尽于此。由于道统观念的实际破灭,他们失去了用以傲视现实的心想依凭,却也因此有可能更脚踏实地,也更充分地发挥作为当路者与民众之交接点的职能。但是转型时期必有的种种扑朔迷离,使原本幼稚的他们常常感到前路茫茫,欲归何之:新与旧的界限并非泾渭判然,新旧之间的得失是非也非斧斫般分明。作为终极理念的“人文精神”,至此已往往因失却安放的基础而变得难以依凭。即使一旦认清了确实先进的新思想新领袖,而甘当追随左右的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,并为他们所深深宝爱的民众沥血疆场,但由于前者在当时同样的幼稚,他们往往被拒之门外,或者进了门又被扫地出门;又由于民众思想对于精英思想的必然滞后,他们如火如荼的热忱,又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屈原的望天呼吁,在当时已成为这身处于动荡时代而尚欠成熟的一群之普遍心声,在这种真诚悲壮的呼吁中,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,竟有了具体而微的缩影;而今天当我们返观他们的行迹心路时,也不必为其每多徬徨,时有摇摆而纳闷,因为除了少数的野心家、权谋家以及徇一己私利的叛徒走狗外,这徬徨、摇摆,正是蝉蜕鱼化时期那苦闷的象征。正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上述特殊地位的认识,在当今政治家、实业家的传记热中,我们设计了这一套有关文化人的回忆录丛书。

这是一套并非历史书的历史书,虽然它未有史乘的涵盖性与理论体系,但真诚的追忆所展开的生动细节,必将促使我们去思考史乘所叙述的“然”背后的“所以然”,或者这“然”是否确实“然”,从而引发我们对现有种种史学构架的审视与修正。

这又是一套并非知识读物的知识读物,由不同层次、不同经历的文化人所展开的,远比其先辈广阔的社会生活网络,将使读

者对这个部分身历而即将逝去的世纪,油然而起方方面面的真切回忆,并进而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种种后果前因。

自然,它们也并非只是小说书,但真诚与素朴永远是美文的底蕴,而文化人特有的敏感与理致,又使这套丛书,在细节的发现与心理的开掘上,更为灵动而精彩纷呈。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,在完成了自己当行本色的学术文化之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同时,也参与并深刻影响了本世纪社会形态的同样巨大而艰难的转型,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?而贯穿其中的文化人与当路者以及民众的历史性矛盾,又是否能给今天某些有益的启示:对于所谓“人文精神”应当如何来理解或者更新?在“造福民众”既因基本利益一致而成为真正的共同目标时,当政的文化人与在野的文化人,又如何才能更多一些相互的理解?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时,我们每一个人又应当抛弃些什么,坚持并发扬些什么?等等这些问题,在审读着案头那一部部文稿时,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于是,想到了一个似乎尘埋既久的名词——白屋。白屋为贫者所居,又衍而为“白屋之士”,肩负民族振兴伟业的文化人——无论是当政的还是野的,是否应当常记这与民众血肉相联的白屋呢?因取以为丛书名。

赵昌平

1999.8

目 录

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
的/1

答客问——谈我的笔名和出
生地/5

有人问起我的家/8

我眼中的清王朝/12

忆妈妈片断/15

小学一页/24

《十五小豪杰》和我/27

我的中学生活/29

从一根鸡毛掸子说起/34

“五四”和我/37

记“一二·九”/40

烽火连天文学路/46

关于《科尔沁旗草原》/52

抗战开始小忆/59

钻浪/61

青岛之夜/64

看不见的线/67

山西,有我的心印/70

编辑《科学新闻》的回忆/74

开明书店和我/79

我的第一篇小说/82

我的第一本书/87

我与“文协”/90

北京是我的一本大书/94

女儿名字的由来/99
保护眼睛/101
打屁股/103
忙里偷闲话老年/107
湘流九转——《短篇小说选》
 自序/113
《端木近作》序/116
《友情的丝》序/122
《车轮草》序/126
黄鹤归来/128
马年浮想/132
梅/135
化为桃林/138
乱点梅花及其他/141
鸟鸣/143
谈“笑”/147
石头记胜/150
昙花/154
贵在发现/157
戏说“流杯亭”/159
癖好/161
我和笔/164
新春说狗/168
风物恩情/171
东北风味/173
故乡之恋/176

永恒的悲哀/178
哀鲁迅先生一年/181
衷心的纪念/184
生活的火花/186
追思——西谛先生逝世二十
 周年纪念/191
鲁迅先生头像和萧红小说插
 图/194
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/199
不尽哀思向虹桥——回忆宋
 庆龄同志/206
欧阳予倩和《杜门诗》/210
我们的老校长——有关张伯
 苓校长的片断回忆/214
人民艺术家老舍/218
忆老舍先生二三事/221
萧红和创作/224
难忘的一次会面/227
阳太阳七十年艺术追求/230
统照先生和我/233
茅盾和我/237
一对缅茄/242
怀念满红/245
追念姚奔/251
老学长高承志/254
别后悠悠君何处/257
记竹刻艺术家徐孝穆/264

李白凤印谱序/268

尹瘦石书画合璧/271

方殷的声音/275

荒烟的木刻——《荒烟木刻选》
序/281

《王森然画集》的启示/284

万里风云关山月/287

记陈迺冬——《陈迺冬诗文选》

代序/297

我是怎样走上 文学创作道路的

我是1912年农历8月15日出生,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鸢鹭树村。因此,我刻有图章,叫“鸢鹭树村人”。

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是曹汉文。我因仰慕屈原,第一次到天津汇文中学读书时,就自己改名曹京平了。

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,但父亲曹仲元具有新思想,说我曾祖父曾打过“黄带子”(即皇室宗族),我祖父曾踢过赵大人的供桌,等等,向我们哥儿几个灌输反不平思想,并以祖上这种反贪官的成绩为荣。他将我们哥儿四个都送去天津上学。

我外祖父是佃农,满族。由于我母亲长得好看,被我父亲强占为妾,生了我们哥儿四个。后来,父亲大老婆病故,我母亲才得以主持家务。我是小儿子,深受母亲疼爱。母亲常将她的身世向我倾诉,嘱我长大后将它写成书。这可以说是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最早契机。

我父亲有间藏书室。我很小就认识一些字,常常溜进父亲藏书室

去看书,《红楼梦》就是那时偷看的。父亲喜欢讲徐文长、纪晓岚、蒲松龄、王尔烈一些人的故事给我听,还教我打谜语、对对子,这引起了我对文字形式运用的兴趣。

1923年,在哥哥带领下,我到天津考入了汇文中学。这时,我陆续读到《晨报》副刊、《语丝》、《创造》、《奔流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,和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等人的作品,以及一些世界文学名著,开阔了我的眼界,铺开了我的生活道路。后来因家庭经济发生问题,供不起我们哥儿四个都在天津上学,加上我母亲想我成疾,我仅读了一年就回昌图老家自学了。这期间,我带回了许多新文学书籍,仍在天津读书的二哥,又不断给我寄来新的书刊、杂志,使我不断接受新思想,我便开始对我的家乡进行各方面的了解,增加我对实际生活的体验。

1926年,我家染上了白喉,我妹妹和我父亲接连去世;我老姑和我也染上了,老姑因赶上二哥从天津寄来的药,得救了;我因用西医治疗,也活了下来。

1928年,哥哥又将我接到天津,考入了南开中学初三插班生。1929年,在南开组织“新人社”,编辑出版小型文学刊物《人间》,后改为“新人”,发表短篇小说《水生》、论文《力的文学宣言》等。后又被选为校刊《南开双周》的主编、义塾的校长、美术学会的会长、学术观摩会的会长、合作社的理事等。同学们都笑我是“苏秦佩六国相印”。这期间,在《南开双周》上发表了一些文章。如论文《人生的探索》、《立体的人生》、《青年运动》、《法国达达主义文学》、《生命解放与青年联谊会》等,新诗有《给××》、《邂逅》、《躲》等。

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我因组织学生运动,要求南下抗日,被学校除名。那时受高尔基《我的大学》和陈贤祥《新教育大纲》的影响,我来到北京,走向社会大学,住在红楼对面的公寓里,结识北方左联陆万美、臧云远等同志,经他们介绍,于1932年夏加入北方左联,任出版部长。编辑《四万万报》、《科学新闻》刊物。同年暑假,中了我哥哥的“激

将法”：他要我考大学，我不考。哥哥说我不考的原因是怕考不取。我一赌气，开了半个多月的夜车，同时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燕京大学生物系，结果均被录取。1932年秋，我进了清华大学历史系。同年冬，在《清华周刊》上，发表了短篇小说《母亲》，也就是我后来写的长篇小说《科尔沁旗草原》里的一个片断。我还在清华自设信箱，和鲁迅先生通信，将《科学新闻》、《四万万报》等进步刊物寄给鲁迅。

1933年，左联遭破坏，许多同志被捕，和我一起办《科学新闻》的方殷、韩宝善和办《四万万报》的冯厚生亦先后被捕。我得讯后，连夜逃到天津我二哥家中。心想目前哪儿也去不了，不如写我想写的小说。因此，整天在小楼上写我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科尔沁旗草原》。记得那时文思像喷泉一样，下笔非常之快，几乎停不下来，不但桌上铺满文稿，就是床上、地上，也都是文稿。当时和我二哥刚结婚的二嫂，是我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，说我写得很好。我母亲还说，如果出不了书，她可以拿钱为我印。前后不到半年写出了这部长篇，当时寄给郑振铎先生，他看后回信说：“预期必可震惊一世人的耳目。”这给我鼓舞很大。写完长篇，我就病倒了。那时，我母亲在北京租有房子，我即去她那里养病，整天埋在书堆里，几乎不与外界接触。

1935年，“一二九学生运动”震惊了我，不顾母亲阻拦，便在12月15日去燕京大学，住在中学同学刘克夷宿舍里，第二天举着大旗参加了12月16日的大游行。面临的又是大搜捕，我于是决心离开北京，经南京，于年底到达上海，住在大厦大学胡思猷处（胡适的侄儿，南开中学同志）。

在上海见到郑振铎，商谈出版《科尔沁旗草原》事，因我对所谓“有碍”不愿改动而搁置，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大地的海》寄给《作家》，被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。因此，化名曹坪写信投诉鲁迅先生，得到热情关怀。在郑振铎建议下，我开始用端木蕻良笔名写短篇小说《鸳鸯湖的忧郁》、《遥远的风沙》、《浑河的激流》、《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》等，发

表在上海《文学》、《作家》、《中流》等文学刊物上,受到老一辈学者、作家的青睐与鼓励。我参加了以茅盾为首组织的“月曜会”,那时有王统照、张天翼、沙汀、艾芜、蒋牧良、舒群、罗烽等人。

从此,我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,至今已写下了近千万字的作品。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一日于西坝河

答客问

——谈我的笔名和出生地

我今年八十岁,写作也六十来年了。经常会有人问我,关于我的笔名问题,还有我的出生地“鹭鹭湖”。这个全国几乎没有第二份的地名,确实是和我国各省市随处可见的同名的地方(如白沙、东山、三家子、二道河等)大不一样。

关于我的笔名和出生地,以前也写文章作过解释。但是最近又有人写信来问我,不妨再作一次“答客问”。

我在十六岁编《南开双周》时就写了许多文章。那时,都署真名:曹京平。1930年我曾给天津《庸报》副刊“另外一页”投过稿,开始第一次用笔名,署名“黄叶”。因为我母亲姓黄,但后来觉得黄叶这个字缺乏应有的生气,不久就不用了。1932年,我加入了中国北方左联编《科学新闻》时,用的笔名就多了起来,如“罗旋”、“丁宁”、“辛人”等。1935年尾,我到上海写长篇小说《大地的海》,完成后不能马上出版。郑振铎建议我给《文学》写短篇,我才开始用了“端木蕻良”这个笔名。“端木”是